

非洲城市化诸时代与格局

[美]艾丹·索撒尔*

1987年非洲300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有人口48600万。这块大陆一般分为撒哈拉以南非洲或黑非洲和穆斯林北非。

从16世纪到19世纪,随着葡萄牙人的到来以及多数其他西欧国家特别是法国和英国的接踵而至,出现了一串新的非洲的城市网。最开始是海岸线外易于防守的岛屿上的贸易货栈,然后扩展成为城市,——如果海岛太小,则迁到附近沿海更为方便的地方。这种外生的城市网是在殖民剥削的掠夺体系基础上建立的,这类掠夺集中于黄金、象牙,特别是奴隶。这与商业资本主义时期相一致。当地城市的手工艺品,如西非的色布,很受欢迎,葡萄牙人甚至收买后再出口。

由于工业革命,对原料和市场的需要变得压倒一切,从而要求越来越多地控制领土,摧毁竞争性的当地产品。到19世纪末,几乎整个非洲内地都处于欧洲殖民当局统治之下,造成了规模大得多的殖民地首府以及省区行政中心的完整网络,这些中心,以及城市化了的矿业和种植园中心,最后都发展成城市。

非洲人与欧洲人之间直接或间接的相互联系越来越多,共同参与奴隶贸易往往成为这种联系的媒介——导致许多新的“杂交”产生的非洲王国发展起来,这些王国的首都是潜在的城市,其形式和结构是本地类型的,但其发展最终要归于欧洲刺激的作用(见Wansing 1966: 152—6, 194—9)。

这类城市中有的变得相当重要,一般通过不平等的二元平行结构被纳入后来的殖民城镇发展过程,其中本地城市文化很大程度上处于被淹没的地步。然而,大多数殖民地城市,特别是在内地,其基础是外来的,没有任何本地文化的成份,只是在奠立后很快吸引或胁迫造成了占多数的、处于依附状态的本地人口。

在15世纪和16世纪,欧洲人在同本地人友好相处和相互敌视的交往中,双方基本上是平等的。但是,随着欧洲人的武器、人力和一般技术进步使他们越来越处于优势地位,他们对非洲文化和非洲人民的态度也越来越带有傲慢、种族主义和贬损的意味,并且愈演愈烈。

差不多30年前,我把非洲城市中本地因素为主还是外来因素为主作为分类的基础(Southall, 1961),这主要是因为我感到本地因素几乎完全被忽视了。从那以后,外部因素变得越来越处于主导地位,几乎完全排除内部因素,只是这种作法有的是非洲人造成的。

在拉各斯、达喀尔、阿比让、金沙萨、内罗毕的黑非洲当代大都市里,非洲人口按某种意义处于政治和人数上的主导地位,当地的市政会和委员会、市长和省长、总统和内阁对日常事务有一定控制能力,但对城市长远命运的控制更多地掌握在住在当地的代表美国、英国、法国和苏联、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各个多国公司的外国人手中。坦桑尼亚可以对达累斯萨拉姆的银行和大公司实行国有化,使之似乎处于本地人的极权主义控制之下,但这从

* Aidan Southall, 美国著名人类学家,美国威斯康星大学人类学系教授,美国都市人类学学会前任主席。

根本上讲是一种错觉。赞比亚可能对铜矿实行了国有化，那些矿山造就了铜带省的一串城镇，它们的收入支撑了膨胀的首都卢萨卡和那里的官僚机构，然而这种单一经济却造成了赞比亚的贫困、脆弱和对那些国有化以前决定命运的国际经济利益集团的依赖。

外生和内生二元成份依当地组成部分的财富、权力和相应规模而有所不同。这里，北非那些有上千年文字历史和商业文明的城市，同黑非洲那些没有这种背景的本地城市一样，都要受类似力量的支配。费赞、马拉喀什和梅克内斯的圣城规模宏大，具有异国情调，然而这只是昔日辉煌的幽灵。

中世纪富于魅力的商旅和长途贸易只剩下无多进项的小零售商业，供应方面则由精美的手工皮革、木器制品变成工业化世界市场上俗气的塑料和铝制品。

非洲城市如何屈服于西方资本主义的进攻，而这又是如何通过迅速扩展的结构实现，其形式各种各样。在开罗，这一过程借助于克迪夫·伊斯梅尔，他在19世纪60年代决心要在古老开罗旁边建立一个能与西欧文化首都竞争的新城，要有宽阔的大街、歌剧院、剧场和时兴的活跃季节，结果使城市和国家一并破产，沦入更为彻底的殖民地仆从地位。在摩洛哥的城市里，法国的利奥泰元帅希望通过建造平行的法国城市的类似办法来保存原有城市的本地灵魂，结果同样无可挽回地摧毁了原有的政治经济格局，灵魂自然也随之枯萎。在坎帕拉、拉各斯或者瓦加杜古等原来有过本地小非洲国首都的地方，这些旧城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容忍，然而依旧被开始在它们旁边最后在它们周围成长起来的外殖殖民地首都所淹没。

今天，非洲最大的城市基本上是外来的产物，就象加尔各答、孟买和马德拉斯等印度现在最大的城市一样。即使是德里，尽管它有城堡、庙宇、陵墓和市场，按其主导结构来说仍是一个西方式的城市，就象开罗、亚历山大港、突尼斯、拉各斯、金沙萨、内罗毕、蒙巴萨一样。但是存在一种梯次区别。印度的城市尽管部分地西方化了，但现在本地人口和文化控制了这些城市并加以利用。北非的城市也是如此，但程度要低些。在热带非洲，还没有足够时间做到这一点，而且由于人口成份更复杂，要做到这一点困难也更大。

南非只是相同过程的一种非常极端的形式。在这里我们看到的不是在非洲内生城市旁边建立外生的、白人支配的城市，而是白人城市要求在其周围建立黑人城市，相互之间形成又爱又恨的关系。黑人在城里没有公民权，当局也不想让他们成为城市居民，但是为了向白人农场主提供土地，并保证黑人象马克思说的那样“自由”得一无所有，黑人的多数土地被剥夺了，他们无可奈何地前往城市、矿区和种植园，为挣得最低工资而作工，对此他们无法回避，因为既没有自给自足的基础作为出路，也没有政治抗议的权利。

这样，从种族主义、法西斯主义的南非，到具有相对自由主义和相对种族主义背景的乌干达和肯尼亚，再到具有悠久城市传统的尼日利亚、摩洛哥、突尼斯和埃及，我们可以看到同一模型中的一系列变种。

拉各斯，黑非洲最大的都市，是一个有趣的例子。该城发源于西非本地商业，其形式是已经受到政府海上殖民贸易的新渠道、新产品和新进程影响并参与其中的武士商人。经过两百多年的发展，尽管其中有一半时间处于英国殖民统治之下，非洲人口得以在相当程度上吸收了现代资本主义商业和工业，同时又保留了一个追根溯源产生于古代约鲁尼城邦的社会和宗教实践的真正核心。在热带非洲的其他城市，任何具有鲜明特征的城市文化的发展还都处于非常早期的阶段。在精英的交流和教育中依赖欧洲殖民者的语言极大地妨碍了这种文化发展，由于不可能从许多相互激烈竞争的非洲语言中选定一种作为国语又不得不这样做，由此

本地文化创造性受到了阻碍。斯瓦希利语在达累斯萨拉姆和所有坦桑尼亚城镇成为本地语，是少数例外之一。

在所有黑非洲国家中，科特迪瓦及其首都阿比让被认为是经济上最成功和最繁荣的，然而即使是这里，也有着不祥之兆。乌弗埃·博瓦尼总统一直是非洲国家元首的模范，支持西方保存民主的外部制度形式，在一个开放的（法国处于支配地位）竞争型经济中鼓励法国和西方投资。科特迪瓦的经济在过去20年中比任何其他黑非洲国家都增长得快得多。实际上，科特迪瓦的扩展是以布基纳法索、马里、几内亚和加纳等邻国为代价的。后三个国家提出的政治纲领、意识形态和结盟关系使西方不快，很大程度上受到西方的抵制。布基纳法索除了密度较大的人口外没有多少可以开发的资源，人口中有很多流向科特迪瓦和其他沿海国家去做工。科特迪瓦成为一个资本主义发展的二级中心，自己受法国的剥削同时又剥削布基纳法索。科特迪瓦的相对发达和布基纳法索的相对不发达是互为补充、互为必要条件的。阿比让作为科特迪瓦的首都是这一过程的指挥部。外国移民主要在咖啡、木材和其它种植园作工，但越来越多地涌向阿比让郊区的棚户区。同其他“异族”一样，他们没有公民权，没有社会保障，没有选举权或工会的保护。阿比让150万人口中有一半出生在外国。自然，他们干的是工资最低、最没技术的话，于是在本地人和外国人之间出现了某种阶级分化。最先失去工作的是外国人，他们受失业之苦最深，并时刻面临着被突然驱逐的危险。

科特迪瓦的迅速增长同巴西一样被经济学家视为奇迹，但这种增长也同巴西一样开始遇到困难。据报道，阿比让的犯罪活动已失去控制，正派公民晚上不敢出门，武装自己，给住所装上铁篋子门。早晨使电站水位降低造成供电不足从而影响工厂和消费者，特别是那些越来越依赖于借助空调和家用电器的奢侈生活的城市精英。法国售出价值2200万美元的发电机，并派出法国反团伙小组清理棚户区，清剿移民中的匪徒，逮捕成千上万的人（见may, 1981）。

毫无疑问，科特迪瓦的经济增长令人印象深刻，阿比让市中心的商业区大厦林立，有一种壮观的“西方式”外表，但是该国的经济现在似乎走入了死胡同，按国民收入和主要出口作物不断下跌的价格衡量债务非常沉重。

如果在西方经济学家眼中，科特迪瓦是最为成功的例子，它也有两大缺陷。第一，它的成功是以邻国为代价的，对邻国的进步来说与其说是榜样不如说是障碍；第二，随着增长速度越来越慢，造成一个富人和穷人、城市和农村两极分化的更加不平等的社会，而又丝毫没有接近具有自我持续能力的增长阶段以给穷人一些希望。该国上了年纪的终身总统遵循非洲最近的其他先例，几乎控制着绝对权力，拒绝考虑接班问题，从而使人们对该国未来的稳定产生疑问。他的家乡亚穆苏克罗人口从15,000膨胀到10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无意之中把该城变成非洲经济依附地位和错误领导的最为生动的象征。他正在让法国和以色列的建筑师帮他建造世界上最大的基督教教堂，装有空调，比罗马的圣彼得大教堂更高、更长，使用4,000种色彩的法国彩色玻璃，7.4英亩意大利理石地面。他从南非弄来大象、长颈鹿、羚羊和河马，宣称费用由他自己承担，1亿3千万美元并不能解决本国的危机。在摩洛哥，国王哈桑据说正在建造世界上最大的封闭式清真寺，估计造价2.5亿美元（见Brooke, 1988）。加蓬的邦戈总统修建了一条耗资30亿美元的通往他的家乡的铁路，扎伊尔的蒙博托总统则在他出生的村子修建了能起降协和式超音速飞机的跑道。

在经济不那么成功的非洲国家，大城市面临着类似的问题，但要相应地严重得多。穷富之间两极分化日益严重，城市人口迅速增长，主要是在棚户区，失业和非充分就业长期存

在，靠着“非正式行业”五花八门的工作勉强糊口。

非洲首都地位过于突出是人所共知的。在10个黑非洲国家，最大城市人口占总城市人口的百分比从50%到83%。同一比例在具有古老城市中心的4个北非国家只有12%到39%。许多造成集中的力量是非洲国家——更不用说城市本身——无力控制的。在无数使馆、国际组织、援助机构和跨国公司中就职的外国人，在一遍赤贫的环境中定下了奢侈生活的调子，本地权贵，如政客、实业家、专业人员和官员，竞相模仿并推向更高水平。无怪乎首都发出诱人的光辉，引来无数移民。他们坚信到这儿可以改善自己的处境，就连那些没有找到好工作和成功的事业的人也往往宣称这样也比不来要好些。这里似乎有一种幻觉效应，那些移民如果没有来会怎么样或能怎么样永远无法肯定。进步的国家元首们力图推掉棚户区，赶走那里的居民，从而改善首都的形象，或者至少是把那些碍眼的定居点藏到乘车从国际机场前往国宾馆的尊贵来访者看不见的地方。

大多数社会学研究都限于对城市的增长和一国城市网络进行描述和提供统计数据，如人口、人口成份、种族和民族构成，以及移民、住房、就业和家庭生活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曾有一种普遍存在的假设，认为非洲虽然是最后一个经历迅速的现代城市化过程的大陆，它最终必将重走与西方相类似的城市化道路。我则认为，在大多数基本方面，非洲（以及多数第三世界）城市的形势，同西方城市在工业革命仍处于类似增长阶段时的形势截然相反。

关于非洲，城市人类学更多地集中于城市化对非洲人民的影响，对他们在农村社会中获得的文化的影响，来自不同农村文化（和语言）的人汇集到城市后的情况，他们如何对待城市环境和诸如住房、就业、男女比例失调一类问题，以及由不同类型的殖民主义城市政策造成的各种各样背景下非洲人中产生的社会组织和文化表现形式。

人类学家由于以往的关注所在，往往过份强调城市移民中的群体和群体协会（他们不恰当地把所有这些群体称为部族）。由于非洲新国家本身十分复杂，黑非洲的城市，按其规模来说，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城市的群体成份都更复杂。非洲流往城市的人为了生存下去和惬意必然要抓住任何救命稻草，一到城里都要一边寻找工作一边依靠亲属提供食宿。这种亲属的义务几乎普遍得到承认，以一种无限制的交互形式发挥作用，受惠于人的人站住脚后，又向其他人提供帮助。然而这种义务都给提供者造成沉重的负担和极大的不便，他们不得不想出种种慎重而又得体的办法来缩短承担义务的时间，除了找工作，年轻人还到城里的亲戚那去上学或者看病。他们要干家务活，因此，区分提供帮助和剥削童工的界限有时是很困难的。

在群体成份复杂的城市中，可以区分出“本地”群体和其他移民即“外来者”。本地群体觉得他们属于城市，甚至“拥有”城市和城市本身——至少是周围地区的土地所有权。为了相互帮助建立群体协会的是那些流入城市的“外来”集团（见Southall, 1975）。在60年代取得政治独立之后，这类集团组织被视为威胁民族团结的分离主义因素，往往被取缔。然而族类群体仍是一个具有爆炸性的、矛盾的然而又是无法回避的因素，因为新民族在很多情况下是由几十甚至几百个不同的群体、语言和文化构成的，很难实现民族建设过程中至关重要的民族文化共同感，也许只是在最高层权贵中才有例外。然而即便是在最高层，那些不断地在公开场合谴责群体对立的全国领导人要依靠群众的选票和对自己权力地位的支持，其私生活也往往基本上是带有群体性的。在任命官员和在各个级别上提供就业机会时，群体继续发挥其不可避免的作用。

在迁居城市的早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和以后，殖民当局的政策以及随之而来的缺

乏城市家庭生活条件的状况，造成了两性之间的严重失衡。流入城市的男子往往比妇女多一倍以上。只有通过卖淫和临时、轮流和双方同意的性交才能使这么少的妇女满足大量男人的需要。在坎帕拉，干达人认为在某种意义上城市是属于他们的，城里的干达妇女人数比男子还略多一点。达累斯萨拉姆的扎拉莫人也有类似的影响，那里妇女的人数相当于男子人数的88.5%。如果排除本地人只计算其他非洲人口，他们占绝大多数。而1959年坎帕拉非洲妇女只相当于男子人数的42%。在社会气候更不利于城里妇女的内罗毕，妇女只相当于男子的40%。在达累斯萨拉姆，斯瓦希利沿海文化和当地建筑形式都对妇女在城市居住更为有利，那里的比率是62.5%。在那以后的30年中，城市地区的妇女人数同男子人数更趋于一致。

在城市条件下，种类繁多的宗教及其复杂的仪式和亲属义务关系的实施受到严重影响，只得大大简化，而且在殖民主义时期，这些宗教往往受到鄙视甚至禁止。这样，在城市中移民原来具有的强烈家庭道德观念被极大地削弱了。尽管如此，仍然有以舞蹈和新的宗教运动形式进行活动的群体组织和群体间组织，这反映了城市群众在苛刻的城市环境中加强群体团结的必要和超出原有群体范围寻找更为广泛的团结基础的需要。对阶级分析方法并不欣赏的观察家把群体看成一种有效的限制因素，但是至少是在过去20年中，尽管群体的内聚力仍很强大，这往往具有破坏性，有时还可以出于政治目的加以调动造成戏剧性效果，但是阶级利益与群体交叉的情况越来越多。群体既然存在，就必须会被操纵和动员起来，于是较大的群体就把较小的群体吸引来与它们结盟，并与处于特权地位的群体对抗，特别是“本地”群体往往被看成针对地位不利的群体扮演剥削阶级角色的人。在东非、中非和南部非洲最富压迫性的白人移民殖民地，从群体向阶级化的转化往往由于所有群体都处于从属地位而受到阻碍。这使所有的非洲人，不论身份和财富都成为一个共同的被压迫阶级，就象在今天的南非共和国一样。但是在取得独立之后，群体间的对立变得尖锐了，就象肯尼亚的基库尤人和卢奥人之间的冲突或津巴布韦的肖纳人和恩德贝莱人之间的冲突所表明的那样。

在北非，前工业化城市同它们的外来孪生城市并存，并有相当程度的自主地位，然而，由于资本主义渗透的影响，前工业化城市经济每况愈下分崩离析，外来孪生城市的吸收力越来越大。在西非，殖民征服时已有许多非洲城市，包括在当地非洲文化和伊斯兰贸易影响混合作用下成长起来的古老内地城市网络，和与欧洲商人3个世纪交往影响下先是在沿海后又越来越多地在内地发表起来的城市。在这里如同在北非一样，欧洲人在原有城市旁建立起自己的飞地城市。在殖民主义事业中具有重要意义的首府、港口、矿山和其他城市，欧洲飞地往往具有支配权力，并由于把非洲人吸引、招募到它们的政治、经济、宗教和娱乐机构中，在规模和人数上都处于支配地位。由于种族偏见无所不在，不论其程度和表现形式多么不同，上述过程一般导致在专供欧洲人权贵的城区和传统的本地非洲城区——如果以前存在并保存下来——产生第三个城市组成部分：语言、血统不同的非洲移民居住的非传统、非本地城区。在50和60年代取得政治独立后，欧洲人独占的地区被逐渐打破，变成了不自在地联系在一起本地权贵和外国权力享受奢侈生活的地区。

在东非、中非和南部非洲，情况更不规则，其特征是一般没有任何重要的本地城市化过程（除了少数例外，如布干达与坎帕拉并存的基博加和非洲—阿拉伯沿海城市如蒙巴萨），以及程度不同的种族分离和歧视，越往南走情况越严重，在南非共和国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凡是有大片气候温和的高原或大量可供开采的矿产资源的地区，欧洲人就迁来加以掠夺，如果两者都有，例如在南部，他们迁入的规模更大。

欧洲人在很大程度上采取了与每一殖民地的政治经济情况相适应的看法和政策。在肯尼亚有白人种植行业，他们建立了为白人城市地区提供劳动力的与之分离的黑人城镇，在整个既有白人种植行业又有白人支配的采矿业和后来的工业的中非和南部非洲地区也是如此。在整个非洲，需要大批雇佣人员的单位码头、铁路、矿山、种植园甚至政府本身，周围都没有现成的非洲城市人口，这些单位为自己的劳动力建造住房，开始是兵营式的单身男子宿舍（假设他们的妻子和家人会呆在乡下的家里），后来是供收入略高的人居住的家庭宿舍。尽管农业种植园可以看成是农村，但种植园的大型劳工营地基本上具有城市特征。当时人们普遍认为，非洲人如果不是受雇于殖民地经济，就与城市无关。目前在南非共和国仍然如此。即便是在按殖民主义标准比较开明的乌干达，当时也认为非洲人不仅不是城里人，也不应该成为城里人，据说这对他们自己有好处。但即使是在这里，也需要大批的人为政府机器工作，从而使他们接触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奇异之处。这产生了长远影响，使越来越多的非洲人希望分享想象中的城市提供的机会，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最早的非洲城市化理论是所谓非部族化理论，第一批城市人类学者发现殖民地官员心中已经抱有这种看法（见molohan, 1957），据说，离开传统家园和集团的非洲人面临着丧失传统文化、价值观念、美德和准则的危险，从而构成对社会的严重威胁。但是由于这种转变在很多情况下都是殖民制度绝对需要的，因此这一理论只能提出一些相互矛盾、注定要失败的政策。提出更站得住脚的理论的是一些在南部非洲工作的人类学家，先是南非的马克斯·格卢克曼和埃伦·赫尔曼，然后是在当时的南、北罗得西亚的戈弗雷·威尔逊、克莱德·米切尔、A·L·爱泼斯坦和其他一些人。这一理论可以用格卢克曼的一句多次被人引用的话来概括：“一个非洲城里人就是城里人，一个非洲矿工就是矿工”（而不是“非部族化了的土著”）。这一理论认为南部非洲的外生城市和内生农村分别构成特定的社会体系和角色丛，迁移工人可以在两者之间移动。

米切尔和爱泼斯坦在他们的城市研究中一方面首倡对社会网络进行微观人种学分析，另一方面首倡对迁移过程进行高度复杂的统计分析，同时分析城市亲属关系和婚姻、群体、职业等级以及新的城市和工业机构的发展。他们认为，在城市研究中可以把城市情景的外部制约因素视为既定和理所当然的。这种看法受到非洲人类学者的批评，因为这实际上意味着将整个剥削和种族歧视的殖民机器视为既定和理所当然的（见magubane, 1971）。

根据格卢克曼以前的一篇文章（Gluekman, 1940），这种方法被称为情景方法，然而格卢克曼的文章却主张一种完全相反的理论途径，按照这种方法，即使对一种短暂情景的制约因素也不能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而要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进行多个世纪的历史分析。

在70年代和80年代，关于非洲的城市人类学和其他城市社会研究倾向于分为两种方法。一类是那些为外国援助机构工作并信奉现代理论的人。根据这一理论，非洲的城市和经济只要接受援助和外国顾问、咨询人员和专家的建议，就可以按照西方资本主义的办法实现繁荣。第二类人依据马克思主义和世界体系的理论持有相反的观点，认为按照西方资本主义的方法，接受西方的资助和建议正使非洲的城市和社会走向更为严重的依附地位和深重危机，这一危机在整个第三世界已严重出现。

目前黑非洲和伊斯兰非洲城市的重要意义在于，它们是正在演出的深重危机之剧的核心舞台。城市继续以一种邪恶的方式集中着最好和很坏的东西，既有最非份的奢华，也有最触目惊心的贫困。当农民和牧民面临灾害和饥荒时他们涌向城市希望得到解救。正是在各国首都，

非洲新国家的领导人同工业化世界及其国际机构的代表就援助方案进行无休止的谈判。也是在这里，殷实的外国游客涌进来又分头前往海滨、胜地和野生动物园。

在殖民主义时代，非洲人中间地位身份的分化实际上是有限的，白人认为根本不存在或者无关紧要，在南非目前依然如此。当非洲人在60年代取得本国的政治独立后，尽管贫富之间的差距在日益扩大，他们一开始仍宣称非洲人之间不存在阶级差别（见Schatzberg, 1979; 1986）。随着分化过程的继续，外部观察家看到非洲社会中正发展起在拉丁美洲声名昭著的邪恶现象：寄生性和非生产性的权贵阶层，贫困的农民，导致城市充斥一贫如洗的失业者。尽管有共同之处，然而关键性的区别依然存在。黑非洲从未经历封建阶段，即使今天，多数农村土地也不归个人所有，不能作为商品出售。尽管欧洲移民和种植园在某些国家具有重要性，但绝大多数非洲人口从总体上说仍保持着获得土地的集体权力。在多数非洲国家，将农村人口赶至城市周围日渐扩大的贫民窟和棚户区的，并不象在许多拉丁美洲国家那样，仅仅是没有土地。在非洲还有一个更令人震惊的因素。大城市中少数人的荣华富贵和受到忽视停滞不前的农村形成鲜明对照，从而导致农村人口中有一大批人——特别是年轻人——越来越不愿意以枯燥单调的农民生活终其一生（Schatzberg, 前引书）。其结果是人们所熟知的，城市和农村同时变得贫困。出口作物的生产停滞不前，导致外汇短缺。粮食生产实际上下降了，导致营养不良和周期性的饥饿现象。不得不从国外进口粮食，进一步打乱国家财政和国际收支，造成通货膨胀和生活水平下降的恶性循环。没有一个热带非洲国家的农业生产与人口增长保持同步。

多国公司用各种好处和彻头彻尾的贿赂取悦政治领导人、军方要人、高级官员、专业人员和当地的实业家，从而争得获利丰富的合同，以及减免税额和有利的汇出资本安排。这使活动和财富集中于上层，集中于首都。这些合同使经济进一步陷入依附状态，优厚的条件耗费着稀缺的资源，好处和贿赂使领导人的注意力集中于瑞士银行和海外的宫殿式别墅（扎伊尔总统有7处），而不是本地的发展。如果他们不合作，西方政府（除了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撤回援助，多国公司抽回投资。如果雨季未能按时到来，旱灾和饥饿现象接踵而至，非洲国家被迫就范，政府摇摇欲坠，为了生存下去乞求运送粮食，提供贷款。如果台上的文官政府，军人独裁者可能接手，如果台上已经是军人政权，就会发生新的改变。这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会插进来，要求政府削减用于食品补贴、卫生、教育和社会性服务的开支，接受不受限制的外国投资，取消对货币兑换的限制，通过强制性失业降低通货膨胀，这有利于提高本地权贵的购买力，并通过压低工资使外资企业受惠。

曾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如几内亚、加纳、安哥拉、莫桑比克和坦桑尼亚，处在一个富于敌意的世界中，领土和资源都远不足以实现自给自足，于是为了生存下去被迫改变他们选定的政策。

西方世界要求廉价的、没有工会组织的劳工，不受限制地获取自然资源，在意识形态方面表示反对苏联的顺从领导人和代议民主制的形式主义标志，如果是军人统治，则要表现出良好意愿，愿意向西方出租军事基地带来急需的政府财政收入和外汇，这实际上等于从西方得到造成国内人民反对的保证。最妙的情况是，压迫性和专制的集团坚定地推行西方要求的政策，而西方政府的发言人则在大庭广众之下对他们的霸道表示痛心，要求采取措施改善就业、卫生、教育、福利状况和民主自由，同时心里明白，他们的虚张声势并不会引起重视。

某些国家在地缘政治和冷战中享有的有利位置使它们享有异乎寻常的讨价还价能力，从而使西方有必要维持这些国家的政府和统治权贵以及他们花天酒地的城市生活。南非、扎伊尔、埃及、苏丹、突尼斯、摩洛哥、加蓬和塞内加尔都属于这类情况。这是又一个作用于首都的集中因素。

我一直在谈论最大的城市和首都，将中小城市放在一边。威斯康星一项关于“非洲农村发展中的小城镇中心”的研究项目认为，小城镇中心对农村发展具有战略意义，不是说它们目前发挥着积极作用，或者不必经过对社会的激烈改造就可以轻而易举地使他们发挥积极作用，而是说如果实现有效的农村发展，小城镇必须从中发挥关键作用。从现有材料判断，很难在非洲，或者亚洲和拉丁美洲，找到小城镇发挥积极作用的例子。少数例外的原因存在于当地特殊的环境。小城镇似乎是压迫剥削体系中最低的一级（见Southall 1979, 1988）。在亚洲，小城镇是人口密度很大而又缺乏土地和资源，结果增长的人口将现有生产规模分割得越来越少，人们也越来越贫穷这种情形的一部分，在非洲则不完全如此。小城镇不大可能成为推动农村发展的富于创造力的地方中心，而更可能成为更大范围内与发展相反的棋局中的小卒。只有在一种真正的下放经济和政治权力的环境中，小城镇才可能发挥促进发展的积极作用。对此，在国际中心有许多议论、声明和正式决策，然而却很少在地方上具体实施。在中心的形式上的分权，往往意味着在下一级中心的更高集权。

那些从事国际发展事业的人似乎认为，可以通过“平衡的城市化”和分散政策使小城镇发挥积极作用，而无须根本改变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在我看来，这是本末倒置。有人认为，既然“广泛城市化和商业、工业增长之间的互惠关系在富裕国家造成了高水平的国民生产总值，一项分散型城市化政策可能对促进平等的经济增长具有特别有益的好处”（见Rondinelli 1980, Rondinelli and dle 1978）。这是反果为因，因为占主导地位的世界体系的代理人，同作为他们门徒的非洲大城市中的核心权贵，以及核心权贵同国内其他人之间存在的特定联系，绝对要求一种集中化的过程，这种过程正在发生，而城市的显赫地位反映了这一过程。除非切断或者改造这些联系，否则上述过程不可能逆转。

作为一种最接近于统计测试的办法，我分析了《1980年世界发展报告》中的数据，表明1960—1980年间在提高人口在50万以下的城市的人口在总城市人口中的比重（即提高中等城市在城市人口中的比重）方面最为成功的是较少的民主国家（荷兰、比利时、丹麦、挪威、瑞典、西德、澳大利亚、英国、爱尔兰、法国、以色列—按增幅顺序排列），都是高度工业化和高技术国家，还有较小的中央计划经济国家（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东德和古巴）。没有一个低收入（即第三世界）国家提高了中等城市在城市人口中的比重。多数情况下这一比重都急剧下降（见Southall, 1982）。南非共和国一如既往，是一个两极发展、独一无二的例子，垄断着几乎所有生产资料的富足的第一世界白人人口统治并且完全控制着大规模的第三世界黑人人口。

卢茨·霍尔茨诺不那么真诚地表明，约翰内斯堡还没有象其他所有规模、发展速度和繁荣状况相近的大工业城市那样经历过内部城市衰落的过程（1984）。没有言明的原因是种族隔离。唯一可能衰落的地区是非白人占据的地区。这些地区都被推土机推掉，那里的居民被赶到索韦托一类远离城市的单独城镇。阶级冲突越来越接近于黑人工人群众与社会的主人白人之间的种族冲突。市中心“先付款后取货”商店是白人资本主义至高无上地位的堡垒。黑人可以在白天把自己的工资花在那里，出神地望着对他们关闭的奢华去处的耀眼灯光，但是

大多数情况下，只有受到严格约束的新雇佣人可以在那里过夜。这是不是值得其他城市模仿的有启发意义的先例——作者似乎这样暗示——实在值得怀疑。

与此相反的是黑人家园的情形，在那里，南非政府毫不夸张地花钱让毫无廉耻之心的科萨、祖鲁、索托·兹瓦纳、文达人等充当傀儡领导人的角色，需要时由南非军警加以保护。在这些遥远而又人烟稀少的地方，乡下是那些岁数太小、太老、为孩子们拖累或者困难太多从而无法为南非经济从事生产性劳动的人忍饥挨饿的地方，而它们规模不大然而迅速扩展的“首都”则为索尔·科尔泽尔（阳光饭店集团）那样的南非实业巨子或美国的假日饭店集团提供了一个建造新颖城市的机会，那是由赌场-娱乐场-阳光（别名“罪恶”）饭店组成的城市，在那里白人和少数有钱的南非黑人可以在周末一起赌博、跳舞、勾搭成奸而又不必顾忌南非法律的处罚规定。

除了这一例子，非洲的大城市和其他部分正在越来越快地向两极分化。可以说，在这方面和其他一些有充分证据的方面，非洲和大部分第三世界的城市化都没有象发展理论所假设的那样重复第一世界的格式，而是向相反的方向发展。世界银行自己的预测表明，在未来的几十年中，第三世界最大的城市将在绝对人口方面大大超过第一世界和第二世界的大城市，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不是因为它们的经济财富，而是因为贫困。

没有哪个非洲城市预计将成为人口1100万到3100万的庞然大物，但是这些起步晚得多的城市将继续以世界上最快的速度扩展。非洲城市人口已达28.8%，超过南亚，但仍低于世界其他地区（见《城市边缘，问题与创新》世界银行，第8卷，第6期，第44—45页）。到2025年，根据预测，非洲城市人口将占58.6%。从1960年至1980年，9个非洲国家经济增长率是负数，另外14个低于2%，6个在2%到3%之间，6个高于3%（《世界发展报告》1983表1）。非洲经济委员会宣布整个非洲1988年经济增长2.5%，而人口增长是3%。现在人均收入只有1980年的80%。同时，已经领先很多的工业化市场国家多数增长率在3%以上。因此，非洲城市爆炸应被看成相对贫困和依附性越来越严重的标志，而不是繁荣与发展的标志。

参考文献：

- Abu-Lughod, Janet (1971) Cairo, 1000 years of the City Invincibl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isty Press.
- Abu-Lughod, Janet and R. Hay (eds. 1977) Third World Urbanization. Chicago. Maaroufa Press.
- Amin, Samir (1973) Le Development inegal. Paris. Anthropol.
- Banton, M. P. (1957) West African City, a study of tribal life in Freetown.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Barnes, Sandra T. (1974) Becoming a Lagosian. Unpublished Ph. 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 (1986) Patrons and power.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 Bromley, R. J. and C. Gerry (eds. 1979) Casual Work and povertv in the Third World.
- Brooke, James (1988) "Ivory Coast Church to Tower over St. peter'S." New York Times (Dec. 19.)
- Cohen, Abner (1969) Custom and politics in Urban Africa, a study of Hausa migrants in Yoruba towns. London. Routledge Kegan paul (ed. 1974) Urban Ethnicity. London. Tavistock.
- Epstein, A. I. (1958) politics in an Urban African Community.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 (1981) Urbanization and Kinship. (Copperbelt 1950--56) .
- Fraenkel, Merran (1964) Tribe and Class in Monrovia.
- Gluckman, Max (1940, 1942, 1958) Analysis of a Social Situation in Modern Zululand. The Rhodes--Livingstone Papers no. 28.
- Gugler, Josef and W. G. Flanagan (1978) Urbanization and Social Change in West Afric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Gutkind, P. C. W. (1963) The African Administration of the Kibuga of Buganda. The Hague, Mouton.
- Hance, W. A. (1960) Economic Location and Functions of Tropical African Cities. Human Organization 19, 3, 135--6.
- Hellman, Ellen (1984) Koniyard, A sociological survey of an Urban Native Slum Yard. The Rhodes--Livingstone Papers no. 13.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Hoffman, Michael (1984) Planning, La^m and the Underdevelopment of a Third World City, Meknes, Morocco, 1912--1956. Ph. 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 Holzner, Lutz (1984) "Thriving Downtown amidst Sprawl; Johannesburg. " Urbanism, Past and Present, No. 16, vol. 8, 2, 23--30.
- Huffman, Thomas N. (1981) "Snakes and Birds; Expressive Space at Great Zimbabwe. " African Studies, 40, 2. (1982) "Archaeology and Ethnohistory of the African Iron Age. "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11, 133--50.
- Krapf--Askari, Eva (1969) Yoruba Towns and Citie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La Fontaine, Jean (1970) City politics; a study of Leopoldville (Kinshasa)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Le Tourneau, R. (1949) Fas avant le protectorat, etude economique et sociale d'une ville de l'occident Musulmane. Casablanca. P. I. H. E. M. (1961) Fez in the Age of the Marinides. 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 Lobban, Richard (1984) "The Three Towns" Capital of the Sudan; Khartoum, Khartoum North, omdurman. "macro-micro levels of urban analyses. " Paper for American Anthropological Association.
- Magubane, B. (1971) "A Critical Look at the Indices used in the Study of Social Change in Colonial Africa. " current Anthropology, 123, 4--5.
- Marx, K. (1973) Grundrisse; Foundations of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New York. Random House.
- May, Clifford D. "How the Ivory Coast picked itself off the Canvas. " New York Times (22 August 1984) .
- S. K. and R. J. McIntosh (1986) "Recent Archeological Research and Dates from West Africa."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 27, 413--442.
- Meillassoux, Claude (1968) The Urbanization of an African Community; voluntary Associations in Bamako.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 Miner, Horace M. (1953) The primitive City of Timbukt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ed. 1967) The City in Modern Africa. New York Praeger.
- Mitchell, J. Clyde (1956) The Kalela Dance. Rhodes--Livingstone Institute Papers. no. 27. (1966) Theoretical Orientations in African Urban Studies. (ed. 1969) Social Networks in

- Urban Situations: Analyses of Personla Relationships in Central African Towns,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 Molohan, M. J. B. (1975) Detribalization in Tanganvika, Dar—es—Salaam, Government Printer.
- Nelson, Nici (1979) "How Women and Men get by; the Sexual Division of Labor in the Informal sector of a Nairobi Squatter Settlement." In Bromley and Gery.
- O' Connor, Anthony (1983) The African City, New York, Africana Publishing Co.
- Obbo, Christine (1980) African Women; their struggle for economic independence, London, Zed Press.
- Parkin, D. J. (1969) Neighbors and Nationals in an African City Ward,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ed. 1975) Town and Country in Central and Eastern Africa, (1978) The Cultural Definition of Political Response, London, Academic Press.
- Plotnicov, Leonard (1967) Strangers to the City; Urban Man in Jos, Nigeria, Pittsburgh, Pittsburgh University Press.
- Rondinelli, Dennis A. (1980) "Balanced Urbanization, Spatial Integr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Asia; Implications for Policy and Planning." Urbanism Past and Present, 1979—80, no. 9.
- Rondinelli, Dennis A. and Kenneth Ruddle (1978) Urbanization and Rural Development; A Spatial Policy for Equitable Growth, New York, Praeger.
- Schatzbert, Michael G. (1979) Politics and Class in Zaire; Bureaucracy, Business and Beer in Lisala, New York, Africana.
- Schatzberg, Michael G. (1979) "Islands of Privilege; Small Cities in Africa and the Dynamics of Class Eormation." Urban Anthropology.
- Shack, W.A. and E.P. Skl5ner (eds. 1979) Strangers in African Societi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Skinner, Elliott (1974) African Urban Life" the transformation of Ouagadougou,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South africa; Time Running Out, The Report of the Study Commission on U. S. Policy Toward Southern Africa, Foreign policy Study Foundation Inc,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rkeley 1981.
- Southall, Aidan (1956) "Determinants of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African Urban Populations" . in Social Implications of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in Africa South of the SAhara, U. N. E. S. C. O.
- Southall, Aidan (ed. 1961) Social Change in Modern Africa,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outhall, Aidan "Kampaala—Mango. In Horace Miner (ed. 1967) .
- Southall, Aidan (1971) "The Impact of Imperialism upon urban development in Africa." In Victor Turner (ed.) Colonialism in Africa 1870—1960, Vol. 3, Profiles of Change: African Society and Colonial Rule, Cambridge.
- Southall Aidan (1975) "From Segmentary Lineage to Ethnic Association; Luo, Luhya, Ibo and Others." In Maswell Owusu (ed.) Colonialism and Change, Essays Presented to Lucy Mair, The Hague, Mouton.
- Southall, Aidan (1982) "Double Talk and the Mythology of Urbanization in Asia." Urbanism Past and Present, Vol. 7, 1, (13) , "What Causes Over-concentration or Decentralization in

- the Urbanization Process" (ibid.)
- Southall, Aidan, Peter J. M. Nas and Ghaus Ansari (eds. 1985) City and Society, Studies in Urban Ethnicity, Life—Style and Class. Leiden, Institute of Cultural and Social Studies.
- Southall, Aidan (1979) "Small Towns in African Development." Africa vol. 49 no. 3. Also as (1979) Small urban centers in rural development in Africa. Madison, African Studies Program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 Staffa, Susan (1977) Conquest and Fusion, the social evolution of Cairo 642—1850.
- Vansina, Jan (1966) Kingdoms of the Savanna.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 Wallerstein, I. (1974) The modern world system, Capitalist agriculture and the origins of the European world—economy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Wheatley, Paul (1971) The Pivot of the Four Quarters, Chicago, Aldine.
- Wilson, Godfrey (1942) An Essay on the Economics of Detribalization in Northern Rhodesia. Parts I and II. Rhodes-Livingstone Institute.
- Western, John (1981) Outcast Cape Town.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World Bank (1982)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1982, 1988.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World Bank (1984) The Urban Edge, issues and innovations. Vol. 8, No.6.

责任编辑：谭 深

(上接第73页)

们从成都调查中得到的证据相比，这些新移民更可能在城市中保持独特的农村习惯和社会型式，因此，他们在适应城市生活方面可能面临着越来越多的问题。

应当承认，这些只是推测，而不是依据成都调查的证据得出的结论。但是如果这些推测是正确的，它们就为今后的研究提出了有趣的课题。应该利用专门为研究城市“流动人口”设计的抽样办法开展工作，这方面有的中国研究人员已经着手进行。在这种研究中，考查一下这些新移民在保持农村习惯和态度方面是否比以前的移民更成功，在适应城市生活方式方面是否遇到更多的困难应该是富于成果的。也许城市人类学家应该敏感地注意与过去的根基有关的、农村导向的紧密关系变活的迹象。例如同乡会一类曾在中国城市十分突出的特征。

责任编辑：谭 深